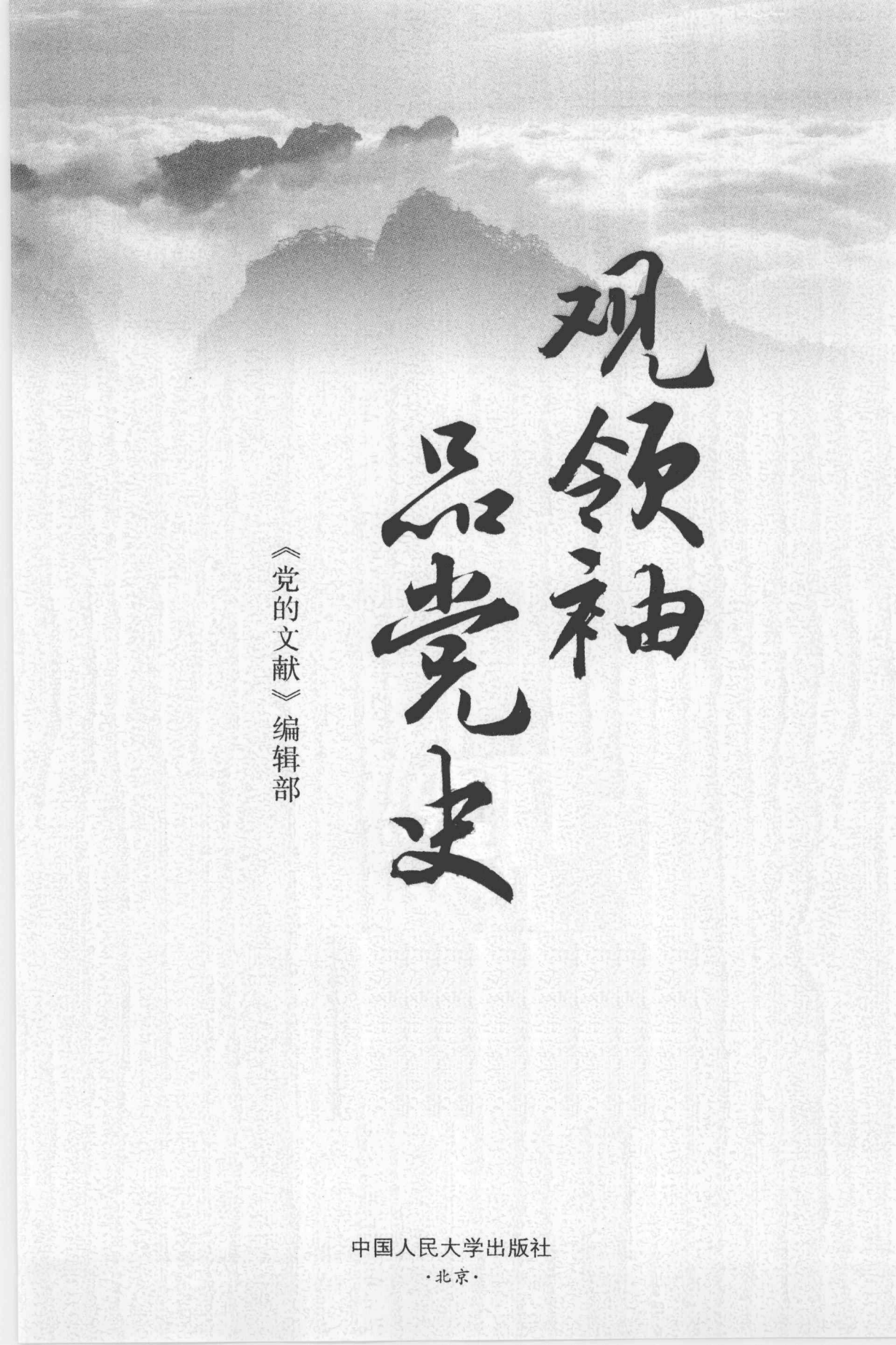


观领袖 品党先史

《党的文献》编辑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观领袖 品党先史

《党的文献》编辑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领袖 品党史/《党的文献》编辑部.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0-18892-8

I. ①观… II. ①党…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 ①D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258 号

观领袖 品党史

《党的文献》编辑部

Guanlingxiu Pindang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50 mm 16 开本

印 张 21.5 插页 1

字 数 348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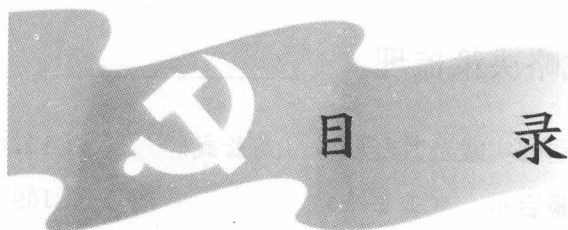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领袖思想散论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 (王香平)	3
略论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及实践 / (戚义明)	17
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 (王香平)	27
刘少奇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 (王为衡)	41
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 / (戚义明)	50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的探索创新及启示 / (樊宪雷)	61
邓小平金融改革思想中蕴含的方法论启示 ——兼析 2008 年越南金融动荡的原因 / (高长武)	75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及其启示 / (戚义明)	87
试论邓小平的发展观 / (戚义明)	99
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中的几个问题 / (高长武)	108
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江泽民对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思考 / (樊宪雷)	127
对青年要“爱”和“严” ——兼论江泽民青年工作思想的辩证思维和时代特征 / (宿 凌)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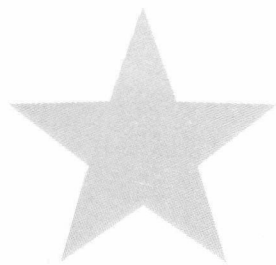
战略决策梳理

新中国成立第一年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及其经验 / (高长武)	151
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及其经验启示 / (王香平)	169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的战略决策及基本经验 / (宿 凌)	185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我国兴修水利的探索实践 及其基本经验 / (樊宪雷)	193
1989—1992: 中国成功应对西方制裁 / (刘志辉)	207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酝酿与决策实施 / (高长武)	220
改革开放以来扩大内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发展 / (戚义明)	238

党史国史探微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沿革 / (王为衡)	253
《大众哲学》: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 (樊宪雷)	262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及其经验启示 / (王香平)	274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启示 / (王香平)	288
党的阶级基础: 我国工人阶级内涵的历史嬗变及其 当前先进性的属性要求 / (樊宪雷)	301
“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的实践 (1997—2002) / (梁 琨)	309
略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 (宿 凌)	324
中国梦的历史自觉与现实照进 / (王为衡)	332
出版后记	340

领袖思想散论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王香平

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至1952年7月调离，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政西南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正是基于邓小平这一时期所展示的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和卓越不凡的政治智慧，才有了毛泽东那一句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①“一把好手”，“好”在哪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赞赏，毛泽东此语绝非虚言。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归纳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各类文电的批示，力求展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哪些方面的成绩、经验、思想和方法得到毛泽东怎样的首肯和认可，由此探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所呈现的特点和风格，这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无启示。

一、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批示的基本特点

所谓毛泽东的批示，主要指针对邓小平以西南局或个人名义向毛泽东或党中央报送的电报、报告、计划和决定等，毛泽东以中央或个人名义起草或

^① 转引自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1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审改的各类批复，包括指示、电报、书信等，不包括其他人代中央起草的批示，也不包括毛泽东就某件事直接给邓小平或西南局发出的电报、指示等。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比照《邓小平年谱（1904—1974）》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关内容，初步统计，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送文电作出的批示共计30份。本文拟以这30份批示作为分析的基础。

1. 关于批示的主题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文电的批示，从涉及的主题或问题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综合性工作报告作出的批示，如《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1950年11月15日）、《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1951年5月16日）等；另一类是针对某一问题或事情作出的专题性批示，其中既包括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党的建设、统战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等宏观性的重大问题，也涉及一些微观的具体事情或问题，如《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1951年10月17日）等。总体上看，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所涵盖的工作领域是广泛而多面的，涉及的问题呈现宏观微观兼具的多层次特征。

2. 关于批示的性质

所谓批示的性质，主要是针对下级机关报送的文电中所提出的工作计划、建议、意见、方法或总结的经验等，上级机关对其作出的明确（肯定或否定）答复或具体指示。遍览毛泽东对邓小平文电的批示，基本上都属肯定性批示，且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词语是“同意”、“正确”和“很好”。在毛泽东的30份批示中，有8份用了“同意”，9份用了“正确”，8份用了“很好”（或“均好”、“好的”），除去3份用词雷同，共有22份也就是2/3以上篇幅是用这3个词语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来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邓小平所送文电的态度。另有一些批示虽未采用这3个词，但同属肯定性批示，如1951年5月4日，毛泽东审改邓小平报送的关于大学对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人员处理办法的指示稿时批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①；1951年4月30日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9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批示西南局“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①；等等。除此之外的其他批示则直接批转各地参考，无疑是对所报文电在更高层次上的肯定，也是下文要述及的内容。

3. 关于批示的要求

批示是上级领导用于批转下级工作报告时所使用的一种应用性文体，它不只是对所送文电作出答复或表态，更重要的是进行“转发”或“批转”，这是批示的核心功能，也是批示的主要意图和根本要求。据此，可以将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提供工作参考。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除个别批示只是针对西南局单方面的工作予以答复或进行指示、指导外，大部分都进行了“转发”，首要目的是为各地工作提供参考。如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把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作参考”^②。1952年3月20日，针对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等问题的报告，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参酌办理，并可在党刊上登载”^③。

第二，推广典型经验。所谓推广典型经验，是指把邓小平所送文电中总结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经验等作为标杆和典范，要求各地直接仿照、研究或采纳。如1950年5月13日，针对西南局关于整风、春耕情况的报告中所提整风步骤，要求各地“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④；1951年12月24日，针对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批示要求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也“仿照西南的办法”^⑤，有准备地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等等。

第三，寻求决策依据。毛泽东批转各类文电，一方面为各地提供工作参考和经验方法，同时也考虑为中央的大政方针寻求来自基层的新鲜经验和做法，以求为中央决策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1951年11月2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1951年9月和10月的工作情况。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6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3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345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627页。

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在电报中称，西南地区将把反贪污、反浪费当作 1952 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 11 月 30 日在批转该报告时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①。12 月 1 日，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斗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毛泽东 11 月 30 日对邓小平电报的批示是他推动和领导“三反”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即把“三反”运动作为一场大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是在这一批示中首次明确的。由此可见，邓小平报送的电报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开展“三反”运动决策的重要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之一。

统观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且在多数情况下赞赏有加。为什么邓小平报送的文电能得到如此多的肯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为什么西南局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能够走在全国前面，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典范？归根结底，这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艺术密不可分。

二、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工作方法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土改运动中，毛泽东就多次采用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建议，他曾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②可见，邓小平的报告的确有滋有味，耐人咀嚼。透过毛泽东的批示，又能折射出邓小平怎样的领导方法与为政风范呢？

（一）勤于动笔——毛泽东批示的频度折射出邓小平汇报的密度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报送文电作出的批示为 30 份，但并不等于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1018 页。

^② 转引自何立波、宋凤英：《共和国成立前的邓小平与毛泽东》，载《党史博览》，2004（8）。

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只有 30 份。根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公布材料的初步统计，从 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 7 月，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共计 99 份（其中 1950 年 39 份，1951 年 39 份，1952 年 21 份），按照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时间 32 个月计算，平均每个月至少报送 3 份^①，其中明确由邓小平起草的文电达 75 份之多。换句话说，99 份中有 2/3 以上的文电都是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修改或审订的。

就邓小平报告的主题来看，不仅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领导西南广大军民开展进行的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大的社会主题，还包括日常工作中关涉行政效率和改进工作作风等一些内容，如 1950 年 8 月 8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致电刘少奇、周恩来，报告关于处理转发文件问题的意见和做法。中共中央 8 月 17 日复电：“关于上面文件，凡与本身工作无关的一律不要转发下去，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并已将你们来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中央各部委，要他们转告各级党委一律照此办理。”^②

就邓小平报告的时间来说，除了事关重大、复杂或敏感性问题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外，还严格履行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的工作惯例，也就是说，邓小平把不定期汇报和定期汇报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前者如 1951 年 4 月 27 日，邓小平在一天之内连续起草三封报送中央的电报：一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西区委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二是西南局批转川北区阆中县镇反工作的报告，三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北区党委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简报。^③ 关于后者，以 1951 年为例，5 月 9 日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 3 月、4 月两个月的综合报告；6 月 27 日致电报告 5 月、6 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9 月 10 日起草关于 7 月、8 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报告；11 月 25 日致电报告 9 月、10 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1952 年 1 月 4 日致电报告 1951 年 11 月、12 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④ 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1 月发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规定的。邓小平不仅在大别山区的紧张战斗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一次公开出版，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料，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公布全部资料，因此，这里用“至少”应是一种保守估计。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935 页。

③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981～982 页。

④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983、995、100、1017、1028 页。

环境中严格执行这一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一以贯之，实属难能可贵。

不论报告涉及主题的宽泛，还是报送文电时间的密集，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邓小平十分勤于动笔，极其重视用“笔杆子”思考工作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践行了他主政西南时倡导的“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①的思想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向中央汇报工作，重视让中央及时了解并掌握自己主政地区的各方面情况，基本初衷自然是希望中央能给予更多的指导或更好的建议，以使自己的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前进。西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取得各方面的发展成就，得到毛泽东的多次肯定和赞赏，主要是当地干部群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的结果，当然，邓小平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善于用笔——毛泽东批示的性质反映出邓小平汇报的质量

为什么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基本上都表示肯定甚至赞赏有加？是邓小平汇报工作“报喜不报忧”？还是西南地区情况简单、工作易开展？或者说邓小平遭遇复杂、棘手问题的机会较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并不在邓小平汇报的是成绩还是问题、喜讯还是困难，关键在于不管成绩还是问题，邓小平都有不同寻常的汇报方式和请示办法。换句话说，邓小平十分善于撰写工作报告，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的缘由之一。试举几例。

1. 关于工作进展的汇报

1950年4月27日，邓小平就部队缩编问题和刘伯承、贺龙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已遵照中央意图确定了将所有干部缩减到八十万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决心贯彻执行。估计是不会出大乱子的。现已决定于四月底开全区的军事会议（各军区负责者都到）讨论上述问题，详情后报。”^②关于部队缩编，应该说关键是结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向中央汇报，一般可能会认为意义

^① 《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907页。

不大或没什么必要。而邓小平把西南局的阶段性工作进展向中央汇报，寥寥几语，便把已经做的（确定初步实施方案）和将要做的（召开全区军事会议），以及西南局领导的主观思想认识（决心贯彻执行）和对客观情势的基本判断（估计不会出大乱子）交代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和意图的坚定性、及时性以及西南工作部署的有序性。这样的汇报无疑是必要的，也是中央需要并希望了解的。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4月28日）即把该电批转各地参考。一份关于工作阶段性进展的报告能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实属鲜见，也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汇报工作的不同寻常。

2. 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

1951年1月6日，邓小平和贺龙等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1950年剿匪情况。28日，毛泽东复电：“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①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表彰，“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毛泽东的兴奋与痛快可谓跃然纸上，但他并非只是看重“八十五万”的剿匪战果，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路线正确，方法适当”。由此不难推断，邓小平的报告不单是汇报战绩，还总结了取得成绩的主要经验。事实上，邓小平在报告中只用了一两句话来讲成绩，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汇报开展剿匪斗争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采取的措施方法等。如关于措施方法，邓小平总结了五条：组织了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进剿；组织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之间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等。^②可见，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邓小平不仅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不单汇报成绩，更注重分析原因并总结经验方法。成绩是客观事实和具体现象，经验则是由具体到抽象的理性分析和概括；成绩只是归纳过去，经验则可以指导未来。有了好的经验和方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可推广开来供他人借鉴学习，其作用和实际效果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作为统领全局的中央决策核心，毛泽东无疑会认为阅看这样的报告有味道、耐咀嚼，由此在嘉奖西南局的同时也把此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

①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962页。

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962页。

西北各军区以及福建、广东和广西军区供他们参考。

3. 关于反映问题的汇报

1952年2月22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及陈云、薄一波等，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的报告全文1000多字，三个段落。报告第一句话直入主题，“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无论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接着讲外部问题“工商业停滞现象”并分析“停滞的原因”，第二段提出西南决定采取的五条“紧急措施”，第三段讲内部问题即一些工作“无人接替”、一些部门缺少“骨干”以及西南想到的三个办法。^①如果单看报告主题“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问题”，一般会认为报告内容大致是列举一系列问题或困难，目的主要是提请中央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的报告则完全不然。他不仅提出问题和遭遇的困难，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对症下药地先行提出应对局势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和举措。换句话说，邓小平不是在向中央反映问题，而是请示西南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妥当，措施是否合适。邓小平“问题—原因—办法”的严密思维和周到考虑，赢得了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的首肯。“三反”和“五反”是全国性运动，邓小平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专门加写了一句话：“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②邓小平善于抓住带普遍性的问题并主动解决的领导思想和方法由此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榜样。根据西南局的建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中央及时调整了“五反”运动的工作部署，并在运动后期进行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

4. 关于工作计划的汇报

1951年11月24日，毛泽东把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点批转各中央局：“西南局委员会于1951年11月9日通过的工作要点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作为自己规定1952年工作计划的参考。”^③“工作要点”实际就是工作计划。

^①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490～49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②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1041页。

^③ 毛泽东批示（195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

一般来说，制定工作计划须因地制宜，各省区各地市社情、民情不同，所处的环境各异，面对的问题千差万别，要完成的任务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把邓小平的工作计划批转各地“研究”和“参考”。看来，毛泽东欣赏的不只是邓小平制定的计划本身，更多的是其制定计划的方法和思路。分析邓小平的报告^①，不难看出其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大局观念。报告第一段话就提出了制定计划的两个立足点，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1953年全国计划经济建设，前者指向当前，后者指向未来，两者都是全国的大局、中央的大盘。制定地方工作计划，从中央的大政方针着眼，可见邓小平看问题的高度和定计划时的大局观、全局观。第二，计划周密，条分缕析。报告第二段话用一句话“因此，明年须完成下列工作任务”作为过渡，开启报告的主体内容（共九项）：增产节约、土改及农村工作、城市工作、财政经济、教育、镇反、整党整风、干部调配、政治学习。九项内容，全面周到，不穿靴戴帽，不拖泥带水，要言不烦，条分缕析，给人求真务实、果敢干练、真抓实干之感。第三，有办法、有步骤、有时限。尽管只是一个工作要点，且内容简短，但邓小平还是在多项工作中提出了完成任务要采取的步骤、方法或预计时间，如关于农村完成土改后的民主建政问题，报告详述了八条关于建立“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举措和考虑事项；关于政治学习，明确提出“与党外人士一道组织《毛泽东选集》学习会或研究会”的具体方法；关于时限，如“省区以上党委一律于明年五月将领导重点转向城市”，镇反中的清理中层“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等等。有了方法、步骤和时间，就等于在可能与现实、未知与已知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人感到计划本身的可行、可靠与可信。因此，这样的工作计划自然会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能赢得毛泽东“很好”的赞赏并成为各地“参考”的范本确实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三）勇于开拓——毛泽东批示的要求彰显邓小平过硬的领导素质和为政风范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90%以上都属“批转”性质，或为工作参考，或为典型经验，或为决策依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邓小平领导下的西南局工作，开展得不单是到位不到位、合格不合格的问题，

^① 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447～451页。

而且是在多方面已然成为全国的榜样，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引领和表率作用。为什么西南局工作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归根结底，这同邓小平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密切相连。换句话说，西南局能取得不菲成就，首先取决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1. 精明强干，善于探索，具有极强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办事能力就曾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创造和总结的经验，取得的辉煌战绩和开拓工作的新局面，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欣赏、赞颂、表扬和推广。他这种独立自主地应对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在主政西南时期，更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1950年解决西藏问题。当时西藏情况复杂，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要完成进军西藏任务，并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邓小平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等重要原则，亲自起草进军守则；在西南局向中央报告解决西藏问题4条方针的基础上，亲自主持起草了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这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后来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的10项政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再比如，刘邓大军进入西南后，先是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解放了重庆、成都重镇，而后指挥部队追剿土匪顽敌。在剿匪工作中，邓小平特别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了土改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毛泽东高度称赞西南地区的剿匪战绩，并把邓小平的剿匪工作报告批转各地学习，还专门致信时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阅看。30多年后，邓小平在同原二野老同志座谈时，仍对西南剿匪感到欣慰：“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①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邓小平坚持不等、不靠、不要的基本理念，时刻立足于独立自主探索应对复杂局面、解决棘手问题的思路、办法和途径。可以说，正是这种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锻炼、考验了邓小平，同时也发展、成就了邓小平。

^① 转引自张继禄、周锐京主编：《邓小平与巴蜀》，2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